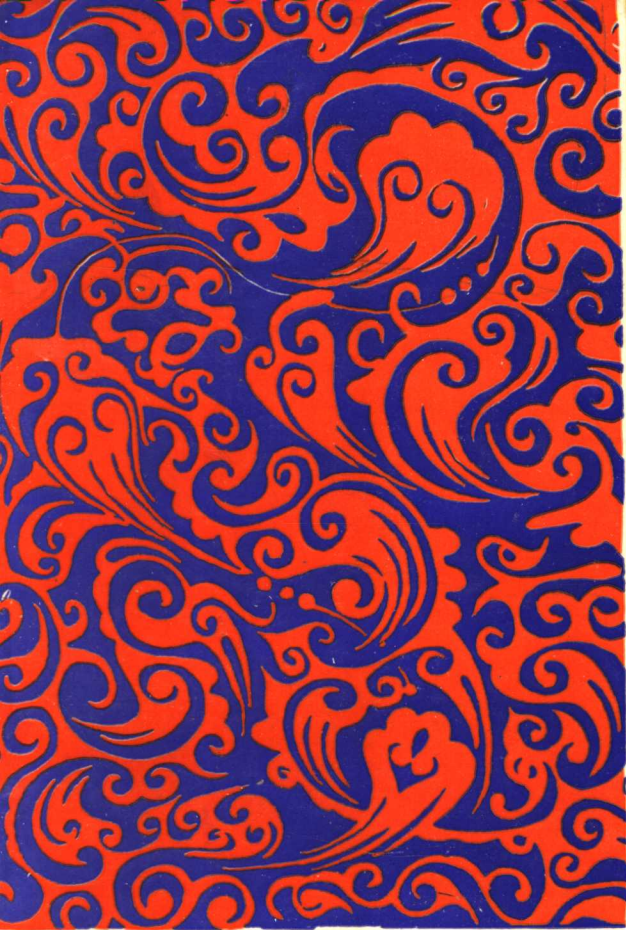


李光地传论

●
许苏民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 许苏民 著

李光地传论

厦门大学出版社

〔闽〕新登字 09

李光地传论
许苏民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尤溪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9.5 印张 2 插页 238 千字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5615-0527-2/K·101
定价：5.00 元

序

我虽不是研究历史的，但是为了探讨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也读一些通史、断代史的代表作。通过研读中国史，发现有如下三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1）凡是对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稳定、教育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经济的繁荣等作出重大贡献的杰出人物，即使生前得不到褒扬，死后也会获得公正的评价，受到人民的敬仰，即“历史是公正的，人民是公正的”；（2）凡是结党营私，耍弄权术，巴结上司，陷害忠良，因受宠而荣登高位者，多只能显赫于一时，最终必然为人民所唾弃；（3）凡当官能善始善终者，多是一些廉洁奉公、勤政亲民的良臣，重视名节的仁人志士，而绝不可能是一些假道学或奸佞。

我作为康熙时代的名臣大儒李光地的第十几代旁亲，很自然对李光地这个历史人物发生兴趣，陆续读了一些评价李光地生平事迹的著作。在略知李光地的生平事功之后，感到他的“生前身后事”似乎难以完全纳入上述三条。论政绩和政治思想，他是康熙帝中晚期领一代风骚的名臣，同代的大臣没有一个可以与他相比拟，他获得中国历史上十大名君圣主之一的康熙帝谥封“文贞”，但是他却未能获得后来的史学家的肯定。论仕途，他虽因为遭同僚的谗言而曾经被疑忌心极重的康熙帝降职、考查使用十余年，但他对此却持“得志而不喜，失意而不忧；……安逸而不乐，患难而不悒”的豁达态度，并以勤政爱民的实际行动和卓著的政

绩回敬那些谗言，终于重新获得康熙帝的信任和重用，视之为：“义虽君臣，情同朋友”，并据此大展其立功立德立言的宏图，登上文渊阁大学士这个位极人臣的官阶，他的仕宦生涯可谓善始善终。论人品，他“积诚致谨，耐事慎交”，弘扬“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统美德，毕生“以民为邦本”，尽力为庶民做好事（如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澄清吏治，平反冤狱；倡导薄赋省刑，反对搞株连九族，等等）；居高位而薄行简用，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不贪位，不爱财，不搞以权谋私和结党营私；为人谦恭而自尊自重，对皇上与同僚不卑不亢；得志时不趾高气扬、颐指气使，失意时也不沮丧；对皇上的过错与失误，“以颂为规，言婉意至”，而不搞无原则的吹捧；对同僚不搞诬陷，对诬陷自己者，不搞以牙还牙，只是作一些必要的申辩；对落难的朋友，侠胆护救，可谓是个仁义礼智信的真诚践履者。论学术造诣，他经史子集均涉猎，并且以“存实心、明实理、行实事”为治学目的，以“学以能择为先”、“读书最怕是无疑”为治学方法，在以孔孟儒学、程朱理学为宗和学以致用的前提下，扬弃了孔孟程朱道学中的一些不适合时宜的观点，吸收了佛教道教以及陆王心学中一些积极的合理的因素，丰富和发展了儒学，把它变为蕴含着适应明末清初商品经济萌芽状态之需要的人性论和“兼爱”平等观以及“忧患天下”、“吉凶与民同患”的博爱观。到了晚年他还努力学习、吸收西方文化，并公开表明了自己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不可谓之奇技淫巧”。更为难能可贵者，他反对道学家关于孔孟之言句句是真理、“祖宗之法不可变”的保守观念，还以孟子的思想不尽沿袭孔子、程朱理学不尽雷同于孔孟为例，论证了改革、“变通”的合理性，认为对改革要持慎重的态度，“固守其常”诚然不对，草率改革也不足取，在改革方案出台之前，要“反复详

审”，“当改革之时，妄动而往固凶；固守其常亦危也”^①。这种对不同学派和西方文化持开放和批判吸取态度的治学方法，迄今仍不失为科学的；他如李的哲学思想、历史发展观（认为从“以农为本”[自然经济]到以“金币为重”[商品经济]的演变乃“势之必然”）以及忧患意识（“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等等，至今也都仍有借鉴的现实意义。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光地堪称为走在同代人前头、在政绩和学术建树方面作出同代人难以媲美的建树的政治家和思想家。遗憾的是，后人特别是史学家对李光地却极不公正。要么对之持不屑一顾的冷落态度，要么根本不谈李光地的事功与学术建树，有些人在没有对李行实事求是地深入研究的情况下，仅仅根据某些第二手材料就对李妄加非议与诋毁，乃至把李贬为“假名臣，真小人”。

对此，我曾经抱有这样的愿望：对李光地进行一番研究，写一本书，用历史事实重新评价李光地的历史功绩和学术成就建树，驳斥强加在他身上的一些不实之词，但拖延了几年都未能实现这个愿望。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自己的史学根底太浅，我多年来所从事的工作并不是历史研究，因而平时没有这方面的资料积累；二是难以掌握到李光地的全部第一手资料。由于李光地长期受訾议、疑谤，因而他的等身著作一百多年来未曾再版过。于是李光地的论著《榕村全集》、《榕村语录》在省级以上图书馆就成了孤本，只许在图书馆里翻阅；在图书馆是禁止吸烟的，而我本人又嗜烟如命，一刻钟不抽烟，就看不成书，写不了字，因而无法到图书馆翻阅、抄录有关第一手史料；三是由于我的专业是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课题，任务很重，无暇旁顾。李光地诞辰350周年即将到来，我的书却只

① 《榕村语录》卷十一《周易三》。

字未写，为此不免汗颜、苦恼。

正在这个时候，青年学者许苏民来榕。我知道他对明清的政治、哲学、思想文化颇有研究，造诣较深，学识渊博，文思敏锐，且精力充沛，是研究和评论李光地的最佳人选。于是我建议他着手这项工作。他欣然而答应，在短短五个多月的时间内阅读、消化完上千万字有关李光地的第一手史料，并写出20余万字的专著《李光地传论》。当许苏民把书稿交给我的时候，我欣喜万分，立即停下手头工作，怀着先睹为快的心情，认真地阅读起来，越读越有味，花了三个通宵，通读了全书。作者请我为该书写一篇序言，我又闭门花了四天功夫重读了一遍。在认真研读了两遍之后，我觉得《李光地传论》不仅是一部带有开拓性、独创性的评论李光地的科学著作，而且是一部贯通古今、利用第一手史料、闪烁着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光辉的高品位的历史人物传论，全书层次分明，文笔流畅，夹叙夹议，妙趣横生，虽穿插了许多史料，却不枯燥乏味而能引人入胜，具有很强的可读性。研读了这部书稿之后，我真正认识到“后生可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真理，真正意识到荐拔、重用中青年学者的极端重要性。说句实在话，要让我在半年的时间内，完成这项繁重的开创性研究任务，并达到《传论》那样高的水平，是不可能的。

《李光地传论》有以下几个特点和优点：

1. 独创性。一部科学论著有没有学术价值，集中表现于它有没有独创性，即独到的见解上面。科学论著的独创性，也叫创见、新发现，即言人之所未言，发人之所未发，并且言之成理（论证合乎逻辑），持之有据（也叫持之有故，即所提出的新论点或新观点，要有事实根据）；史学的新观点，要有经得起检验的第一手史料或史实作根据。《李光地传论》的独创性、创见表现于许多方面。

第一，《李光地传论》的作者一反旧说，把李光地作为正面人物、大政治家、大思想家来论述。李光地在生前就深受群小奸徒

的交章弹劾与诽谤，加上曾被一些人誉为“清代杰出的历史学家”的全祖望把这些诽谤概括为“三案”，即“早年则卖友，中年则夺情，暮年则居然以外妇之子来归”，使得李光地被人们视为人品很坏的小人。“三案”说代代相因，谬种流传。直到近代，大学者梁启超、钱穆等人，都把“三案”视为定论，并且以人废言，只根据莫须有的“三案”说把李光地痛骂一顿，而对李的功业、学术建树则持抱着不研究、不评价，甚至不屑于一读的态度；直到去年出版的、由集体编著的巨著《清代全史》，仍把李光地斥为“假道学”。而青年学者许苏民却不受那一些学术权威关于李光地的评论之观点的束缚，而根据“原则（结论）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研究的结果”这个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径直去细读李光地的原著，在登入堂奥之后，许苏民大开眼界：原来李光地是一位对经史子集、诸子百家都有研究、且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的大学问家，善于撷取百家之精华而成一家之言的大思想家，能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在其论述理学思想的著作中，朦胧地表述近代启蒙思想的萌芽，并且反对把西方科学技术视为不足取的“奇技淫巧”的传统观念，认为“工之用极大”，主张学习、吸收西方科学技术。到了晚年他还努力学习西方的天文历算之学。这一研究结果，构成《李光地传论》的第二章《李光地的思想和学术成就》。此章所挖掘出来的至今鲜为人知的李光地的思想观点，其详备程度是以往有关李光地的评论所不可比拟的，而且许多观点经作者分析批判，成了有借鉴价值的论述。

第二，与一些轻信“三案”说的人相反，作者既不轻信别人所说，也不走引用第二手资料的捷径，而在研究有关“三案”说的来龙去脉的第一手史料，并对这些史料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逻辑法则进行疏理、对照、分析后发现：所谓李光地的“三案”，纯属李光地的政敌和妒恨者对李光地的诬陷之不实之辞，应予以推翻，还李光地固有的高风亮节和高尚的人品。以“卖友”为

例。作者把陈梦雷的四篇有关指控李光地的文稿梳理出来，加以对比，不仅发现陈梦雷的“卖友”之说前后矛盾，并且发现他在前后矛盾的四篇文稿中有一个共同点，即梦雷始终说李光地向康熙帝献平耿逆（精忠）计策的疏稿是由他拟定的，他的奏疏是建议康熙帝派兵攻进杉关直取福州，而李光地献的《蜡丸疏》的实际内容却是认为仙霞关、杉关有耿精忠的重兵把守，由此进攻是“不知出奇以捣其虚”，是一种失策；《蜡丸疏》中所谓的“虚”，是指“汀州一路，……敌所置守御，不过数千疲卒”，据此，李光地建议康熙帝“选精兵万人或五六千人，诈为入广之兵，道经赣州，遂转而向汀州”乘虚进攻入闽，“横贯其腹”。《蜡丸疏》的献策，与陈梦雷所说的进兵路线则完全不同。因此，作者得出结论说：《蜡丸疏》的内容与梦雷的所谓献策无关，因而李光地在《蜡丸疏》上不具陈的姓名，是合情合理的。说李“负友”、“卖友”是不能成立的。作者还以史实证明，李光地作为陈梦雷的同乡、同僚、同榜进士，对梦雷是够讲友情的。康熙二十一年，当陈梦雷因“从耿逆”罪而将被判处斩时，徐乾学要求李光地上疏为陈求免死之情。李光地请徐写个疏稿，徐跑出去与梦雷共拟疏稿，李光地照抄送上去，于是才有李上疏言及陈梦雷从逆出于不得已、在耿反叛时期陈曾两次与李共议破贼之计事，陈梦雷也因此免死戍奉天。由此足以证明李不仅没有卖友，而且是救友。

至于“夺情”一案，许苏民也根据第一手史料，证明此案同样根本不能成立。并且认为，李所以会被人强加给“贪位而忘亲”（夺情）的罪名，康熙帝所以会轻信徐乾学、熊赐瓚关于李有“霸王之志”、不甘当人臣的谰言而把李作为疑忌、打击的重点对象，恰恰是因为李光地太不贪位，太孝敬父母亲，屡有乞归或请假回家事亲之请的缘故。

由上述可以得出如下带有方法论意义的结论：治史最重要的是掌握、挖掘第一手材料，详尽占有史料。遵循这一条，年轻学

者也可以在某些领域作出学术建树；背离或忽略了这一条，仅沿用旧说或利用第二手材料，大学者有时也会得出贻笑大方、经不起严格考证的结论。

2. 科学性。所谓科学性，是指论点、论断的真理性经得起历史的、现实的以及未来的实践的检验。严格地说来，独创性、创见，只有当它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具有科学性时，才有意义，也才能叫真正的创见。但是有鉴于一些学者不加分析地把“言人之所未言、发人之所未发”的观点笼统地视为创见，我们有必要把独创性、开拓性、新颖性同科学性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以判明其真假和学术价值。离开科学性来讲创见，把一切新的论断、说法不加分析批判地当做现成的真理加以引用，就很可能谬种流传，贻害无穷。一些学者，甚至一些享有盛誉的史学家，把有人对李光地的诬陷不实之词概括为“三案”这个“创见”视为科学定论加以沿袭，就是如此。而《李光地传论》的独创性、创见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始终把独创性、创见与科学性结合起来，在于它的一切新观点，都是从第一手史料中概括出来的，经得起真实史料的检验。例如，与近现代一些史学家沿袭全祖望关于李光地学术“唯律吕历算音韵颇称有得，其余亦不足道”的旧说相反，作者通过深入研究李光地的大量原著，发现李光地是一位创造性地发展了孔孟儒学、程朱理学、并表述了启蒙思想萌芽的大思想家。这是一个新的科学发现，相对于旧说而言，这又是一个创见。当然，真正的创见者，还是李光地。但是，倘若不经过作者这一番研究、疏理和整合，李光地的创见也许会永远被淹没，甚至会失传。因此，作者之功不可没。

3. 溯本追源。任何一个新观点、新理论的提出，都有其理论渊源和社会根源；任何一个历史冤案，都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因此，对一个历史人物的思想观点和历史冤案的疏理和澄清，倘若仅仅停留在疏理和澄清上，而不深入分析形成新观点的理论渊源

和社会根源，不追根溯源找到产生历史冤案的来龙去脉，那还不能说是彻底的。而彻底性，又是理论之所以能说服人、为人们所掌握的必要前提条件。《李光地传论》的作者深知这一点，所以努力去做这项工作，尽管这项溯本追源的考查工作，比就事论事地疏理澄清工作，要困难得多——它不仅要求有深邃的洞察力、渊博的知识，而且要求研究更多的历史资料，从中发现问题的来龙去脉及其关键之所在。作者为了理论的彻底性，增加理论的说服力，在这个方面是下了一番苦功的。

“三案”说，事见全祖望的《答诸生问榕村学术帖子》中，有关“三案”的文字约二百字。就事论事，推翻“三案”说并不困难。问题是：全祖望是清代颇有名气的史学家，他写了不少经得起检验的史学论著，为何在评论李光地时，却妄加诋毁以贬损自己的声望呢？作者认为，全祖望仕途不得志的经历，使他对像李光地这样一个几乎一辈子跻身朝廷、颇受重用的人怀有偏见，也使他在对李光地的评论上丧失了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所应有的客观和公正。

这样的分析虽然有道理，但是仍然不足以令人完全信服。因为人们面对这种分析会问：全祖望作为当时一位颇有名气的史学家，难道他在评论李光地时，会一点也不讲史料根据吗？于是作者就去考证这个问题，并且发现史料根据还是有的，不过全祖望所据以建构“三案”说的史料，是陈梦雷的“卖友”说、李光地同僚彭鹏的“贪位而忘亲”说以及一些市井浮言，所有这些“史料”，都是李光地的政敌编造出来的诬陷不实之词，似是而非，不足为据。为此作者整整花了一万多字的篇幅，旁征博引第一手史料，以证明陈梦雷、彭鹏等人对李光地的评说，确实属于不足为据的诬陷不实之词。

但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诽谤李光地“卖友”、“夺情”的，还有其他史学家。一些史学家根据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帝革李光地掌

院学士之职、康熙三十三年康熙帝又不让李光地回家为母守制（守丧、守孝）这些事实，证明“李光地等人当初的落井下石（即卖友），当已为康熙帝掌握”。言外之意是，康熙帝不让李回家守制，是为了惩罚李光地当初的卖友行为。并且认为这就是康熙帝所说的“我留他在任（后来在九卿的交章弹劾下，改为离任在京守制——引者注），自有深意”。全祖望也说，康熙帝不让李光地回家守制有人说是因为“前此昆山徐尚书（乾学）深妒榕村（李光地）之进用，谗于圣祖（康熙帝）。……愚谓圣祖之时不应有此，恐出榕村文过之口”。

为了弄清这些是非，作者通过查阅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又发现了一个至今仍鲜为人知的“奥秘”：李光地有一度之所以被革去掌院学士职，成为康熙帝的疑忌、打击的重点对象，康熙帝之所以不让李回家为母守制致使李光地的政敌据此攻击李“贪位而忘亲”（“夺情”），都同“前此昆山徐尚书深妒榕村之进用，谗于圣祖”有很大关系，全祖望仅用“圣祖之时不应有此”这个朦胧的推断与揣度，对此加以否定，自是苍白无力的，它否定不了康熙帝真有轻信谗言之事这个客观史实。

作者通过历史考证发现：徐乾学系与李同榜进士，他考取二甲第三名，李考取二甲第二名。徐乾学颇受康熙帝重用，入主南书房，为康熙帝拟文稿、改文稿，并受命监察廷臣的动静，是康熙帝用以控制廷臣的鹰犬。徐乾学在出任刑部尚书之前，一直觊觎掌院学士职。他自视甚高，嫉贤妒能，不能容忍汉族文人中官职比他高的人，凡比他高者，他都设法把对方整倒。看到名次排在他后面的同榜进士李光地因平定闽乱有功先于自己擢升为内阁学士，他遂生妒恨之心，于是唆使陈梦雷编造谎言诋毁李光地“负友”、“卖友”。康熙帝虽不信，但由于徐乾学的党羽的交相传播，不明真相的人就信以为真。后来，由于李光地献策统一台湾有功，于康熙二十五年又被提升为掌院学士，对此，徐乾学及其

党羽更是妒火烧心。于是四出散播流言蜚语，对李光地的为人大加贬损。更有甚者，徐乾学借孝庄文皇后逝世之机，设下了置李光地于死地的圈套与骗局。李光地本来决定迅速回京参加叩谒，可他在从安溪奔往福州的途中，却接连接到徐乾学的两封信，叫李不必急，迟到不要紧，徐乾学还带信给福建巡抚张仲举，嘱他设法拖延李光地的行程。同时，他又给他的同党熊赐瓚去信，叫他日夜兼程赶回京。结果，熊赐瓚比李光地提前五天至京。接着，徐乾学唆使熊赐瓚去进谏。熊对康熙帝说，他的哥哥熊赐履说李光地的书不通。康熙帝问：“书不通，人如何？”徐乘机进了许多谗言，其中最毒的一条，是说李光地的本家“湖李家族有万八之众，李光地有霸王之志，其为人臣非其本志。”这就触痛了康熙帝的痛处。为了打击李光地，康熙帝首先拿光地的好友德格勒开刀，强迫他供出自己与李光地结党营私的事，想据此严惩李光地。无奈德格勒在严刑拷打下，也否认有此事。在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初，康熙帝又径直命令九卿等廷臣审问李光地，并派十几名手持大刀的武士围于四周，大有欲置李光地于死地之势。此时，突然出现的一个自然现象救了李光地。原来，正在严审时，出现了日全蚀、白昼无日光的现象，康熙帝对此大惊失色。他相信“天人感应”说，认为凡是出现异常的自然现象，都是上天对天子过错的谴责和警告。加上李光地在这种场合下也只承认自己误荐了德格勒，对结党营私，非议朝政，则说根本无此事。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帝传谕说：“事已昭著，（本）应将李光地治罪，但李光地前为学士时，凡议事不委顺从人。台湾之役，众人皆谓不可取，唯李光地以为必可取，此其所长，除妄奏德格勒外，亦无如此启奏之事。姑从宽免其罪，令仍为学士。”但是此时康熙帝对李光地是否会利用其“万人之众”的家族势力及其在福建的感召力搞“犯上作乱”的问题仍持疑忌之心。所以他紧接着就说：“嗣后勿再妄冀外任并希图

回籍，宜痛加省改，勉力尽职。”^①过了一年，因李光地反对“捐纳”（即卖官），康熙帝就借此把他由掌院学士降为通政使。李光地忍辱负重，经受了10多年的严峻考验，才重新获得康熙帝的信任与重用。

许苏民通过上述溯本追源的评介，才令人信服地证明：所谓“卖友”，乃是当时朋党之争的产物，是政敌强加给李的罪名；所谓“夺情”，是康熙帝轻信奸佞谗言而疑忌李光地、防范李光地实现“霸王之志”而造成的。

至此，所谓“卖友”、“夺情”案，也就被彻底推翻了。至于所谓“暮年则居然以外妇之子来归”案，连对李光地持不同看法的清史专家陈祖武同志也认为此说是“并无充分依据”的“市井浮说”^②，“将其引入著述而评价历史人物，这本身就不是一种严肃的态度。”因此，《李光地传论》的作者没有对此进行“溯本追源”的论述，也就不足为奇了。

总之，我认为《李光地传论》的一大贡献，就是根据大量的第一手史料，对导致李光地长期受冷落的“三案”说予以彻底的、令人信服的推翻，使坚持“三案”说者再找不到借以支持“三案”说的依据。

4. 开放性。这里所说的开放性，主要不是指《李光地传论》作者首次发现了李光地具有主张吸收西方科学技术、吸取各种学术流派的积极因素的开放思想，而是指它在评论李光地的历史功绩、学术主张时应用开放的、发散性的思维方式；是指它不拘泥于就事论事，就论著评论著，而是把李光地的仕宦际遇放在李所处的具体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加以考查，对李的学术观点，不仅考察其源流和社会经济根源，而且把它放在今古中外的各种学

① 《康熙起居注》第1758—1759页。

② 《文献季刊》1989年第3期第134页。

术流派中加以比较，借以准确地揭示李光地的仕途虽然坎坷但总算获得善始善终的深层原因，以及准确地确定李光地的学术贡献的历史方位。这种评论方法的开放性，使《李光地传论》高出一一般传记一筹。

作者在《李光地的历史地位》这一节中，明确地阐明了自己评论历史人物的开放性方法。

“评价历史人物，必须把它放在所处的特定的时代、特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考察，必须以他所处的时代以及和他同时代的人们的‘良知’（同时代的先进思想观点和道德品格——引者注）为尺度。这样做，既是为了坚持历史研究的严格的客观性，避免把历史人物现代化；也是为了防止苛求古人，以免对历史人物的思想和行为作出隔膜的揶揄和谬误的判断。

“然而，要了解一个特定时期，又必须跳出它（特定的历史时期）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的先进的思想和事功进行）比较。这种比较更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时期（的性质、特征），特别是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要求（的具体内容）。而要了解李光地所处的历史时期（及其政治思想的历史地位），无过于将这一时期（以及这一时期的先进人物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放在中国传统社会发展的总体性行程中来看，并将这一时期与在此之前和之后的历史时期相比较。”（括号中的注系引者所加）

从明代隆万到清代乾嘉时期的时代特征是，一方面，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某些突破旧的新事物（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与启蒙思想萌芽），另一方面，新事物又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而呈现出“死的拉着活的”的奇特现象。生于斯、活动于斯的历史人物，哪怕是最杰出的历史人物，其思想观点与政治实践都不可能不或深或浅地打上了这个时代的烙印。

《传论》的作者正是从这个总体性视角的高度和深度来评价李

光地在中国政治史上和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的。从总的方面看，李光地是站在新生事物一方的先进人物，是在摆脱“死的拉住活的”的历史过程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思想家。明末清初战乱不已，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则要求社会安定，国家统一。同时，还要求革除清兵入关时所造成的“圈地”弊政，保留和发展比满清更为先进的汉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妨碍农业发展的水患；减轻人民的负担以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要求放宽海禁，允许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发达的沿海地区开展正常的海上贸易活动；等等。所有这一切，在李光地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活动中，均有所反映。《传论》对这些也恰如其分地予以评介。此外，《传论》还评述了李光地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劝说康熙帝废除沿袭两千年的秦制酷刑，反对株连无辜，制止了“十家连坐之法”的颁行；协助康熙帝整饬吏治，革除卖官弊政（康熙二十八年他曾因反对卖官而被革职）、惩治贪官污吏；振兴教育，荐拔人才^①；更为重要的是，李光地劝说康熙帝把“道统”和“治统”结合起来，把传统的经学与性理之学合二而一，并奉旨编撰了《朱子全书》、《性理精义》、《周易折中》等著作，为清政府奠定了思想统治的重心，在落后民族入主的情况下延续了中国传统文化。

《传论》据此认为，李光地上述的各种活动，对康熙年间经济恢复和发展，社会安定，国家统一，文化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并为后来雍正、乾隆、嘉庆三世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雍正帝赞誉李光地为“昌时柱石”，并非溢美之辞。

《传论》的另一个可贵之处，在于它根据一分为二的辩证法，在对李光地作出了上述肯定性的评价之后，也实事求是地指出：“李光地也有他的局限性。他将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确立为（当

^① 对此《清儒学案》说：“本朝之名公，称善育才者，必以光地为首”。

时)官方意识形态,这在中国社会新的生产方式(指商品经济)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时代,尚不失其历史合理性,但他没有也不可能看到,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尽管他抛弃了其“灭人欲”的消极因素——引者注)对未来中国社会的消极作用。他晚年也有一些保守的做法,例如鉴于明末矿工暴动的教训而制止云南开矿。这种做法不仅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同他的社会进化论——认为从‘以农为本’的农业经济到以‘金币之重’的商品货币经济的演变乃‘势之必然’的观点相矛盾。”

更为可贵的是,《传论》的作者并不满足于此(本来作为一本历史人物传记,做到一分为二就相当可以了,完全可以至此为止),他还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及其发展的历史长河的角度来进一步评论李光地,认为“李光地与康熙帝(晚年)的‘君臣际合’,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到鼎盛时期的文化象征,是儒家政治理想的最高体现。中国传统政治有一个……特点,就是皇帝与几位大臣共同治理国家”。君臣合作得好,即谓之“君臣际合”;反之,即被称为“独夫政治”。“历史上政治比较开明、文治武功卓著的时代,通常是‘君臣际合’的时代。”

“康熙时代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成就,除了玄烨个人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和颇为直接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些具有治国安邦本领的杰出的知识分子充当了这位开明君主的股肱心膂。而辅助康熙帝达数十年之久的李光地,正是对这个时代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繁荣作出了最重要贡献的人物之一。时代造就了康熙帝玄烨,也造就了作为‘昌时柱石’、一代名相的李光地。……他们(两人)作为高层统治集团中的重要成员,是发展到17—18世纪的中国传统社会所可能造就的明君贤臣的典型”;他们两人的关系,“也堪称是那个时代的‘君臣际合’的典型”。清代中叶以后,“中国社会发展日益呈现出旧的拖住新的、死的拖住活的特征,儒家的社会理想已日益表现出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于是,我们